

看世界

林被向 董经胜

拉丁美洲如何掉入债务陷阱

在西半球,美国与墨西哥边界以南,有一片广袤的土地。这里有大陆,有岛屿;有高山,有大河;有草原,也有沙漠。这片色彩斑斓的土地就是拉丁美洲。

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承担着宗主国出口农、牧、矿产品的角色。19世纪初,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地区摆脱了宗主国统治,但延续了独立以前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直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后,才逐步向进口替代转型。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至少在主要拉美国家中,进口替代战略相对成功。1950年至1981年,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增长5.3%。

但是,由于过度的市场保护和国家的干预,进口替代也产生了国际收支失衡、通货膨胀、工业竞争力低下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凭借国际资本市场上较有利的融资环境,拉美国家开始依靠举借外债维持经济发展,由此导致外债不断增长。

债务问题的根源在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一方面,拉丁美洲工业品出口额虽然持续增长,但初级产品仍占出口总额的90%以上;另一方面,大约从1955年以后,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日益强调耐用消费品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生产,需要大量进口昂贵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导致进口大大超出出口。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跨国公司控制了拉美相当部分制造业的接管。20世纪70年代,跨国公司在拉美每投资1美元,就汇往母国2.20美元的利润。

为弥补支付赤字,拉美国家不得不从国外金融机构大量举借外债。统计显示,1970年至1980年,拉丁美洲的外债从270亿美元上升到2310亿美元。空前充裕的资金使拉美国家在西方

经济陷入“滞胀”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5%的GDP增长率。

但是,负债增长战略延误了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时机,并引起了商品进口的失控和广泛的金融投机,从而埋下了债务危机的隐患。

1981年,全球石油价格暴跌,严重冲击了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墨西哥经济,迫使墨西哥货币贬值。1982年2月,墨西哥宣布1美元兑换47比索;同年底,1美元兑换144比索,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当年7月,墨西哥被通知,不会得到国际社会新的贷款;8月,墨西哥财政部长宣布,由于外汇短缺,墨西哥无法支付高达840亿美元的短期债务。以此为起点,债务危机开始席卷拉丁美洲,使整个20世纪80年代成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1981年至1989年,拉美地区人均GDP下降了8.3%。

虽然债务危机的成因是复杂的,但是按照美国财政部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观点,债务危机的根源在于拉美国家长期推行的进口替代策略及其带来的经济结构性扭曲。因此,“拉美债务国只有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调整,才有资格被减轻债务负担”。

1985年9月,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提出债务重组计划,由发达国家的主要商业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金融机构,在3年内向债务国提供29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但是债务国必须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其中主要包括“削减政府开支,紧缩财政,开放经济,放宽外资进入条件,鼓励竞争,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国有企业私有化,发挥私人企业积极性,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贝克计划的实质是,以提供贷款为条件,迫使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包括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理论。当它以贷款条件的形式被强加在经济脆弱的国家上,通常会表现为严厉的结构调整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

对于20世纪末的拉丁美洲而言,新自由主义调整实际上就是彻底放弃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转向外向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智利是最早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拉美国家。当时,智利对大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大幅度地降低进口产品关税,大力促进林业、渔业以及水果等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此过程中,很多本国企业在与外来产品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面临倒闭,导致失业率

急剧上升。但同时,通货膨胀率从1973年的500%下降到1981年的9.5%。

墨西哥在债务危机爆发后,也开始推进国有企业自由化改革。1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协定生效后,美墨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加,从1993年的830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080亿美元。但是该协定对墨西哥一些经济部门的冲击也十分明显。例如,大批种植和生产玉米的农民,在美国进口玉米的冲击下纷纷破产。

在阿根廷,1989年上台的卡洛斯·梅内姆政府宣布,向进口商品开放市场,削减对国内工业的补贴和市场保护。同时,政府对几十家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1991年3月,为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发行新货币“新比索”取代此前的货币,新比索与美元等值。此外,阿根廷还通过解雇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员,减少在健康、教育、福利、养老金等领域的开支,削减政府开支60亿美元。

巴西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1994年,巴西推出“雷亚尔计划”,从1月1日起发行新货币雷亚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通货膨胀率就被控制在10%以下。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巴西经济开始出现动荡,大量资金外流。

综合来看,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全盘放弃进口替代战略,重新回到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道路上来。这种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体上看,在进入21世纪之前,拉美经济增长水平普遍较低。

2003年至2008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资本流动性增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拉动了拉美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增长,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加快,GDP年均增长率达到4.8%,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3.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拉美国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拉美国家总体上比较顺利地度过了此次危机,2010年后经济普遍恢复增长。

2012年之后,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对原材料、能源等产品的需求下降,叠加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大量美元离开发展中国家回流美国,拉美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部分经济体通货膨胀水平失控,货币严重贬值,经济陷入衰退。例如,阿根廷在这种压力下出现债

务违约,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融资的途径。从2013年到2019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体GDP增长率分别为2.9%、1.2%、-0.2%、-1.0%、1.1%和0.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对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后

果是“去工业化”。1990年至2018年,拉美国家的平均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1%下降到13.4%,降幅和降速都要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具体国家的数字则更为惊人:巴西从22.1%下降到9.7%,乌拉圭从28.0%下降到11.7%,巴拿马从15.3%下降到5.8%。

在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最早被卷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地区。自从1492年美洲被“发现”后,拉丁美洲彻底融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但是,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一直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一直受到外部市场、外部投资的制约。现代化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强了其经济对外依附的特点。

拉美的这段教训,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引以为戒。

戈斯拉尔,这座隐居于德国哈尔茨山脉脚下的中世纪古城,像一颗从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的宝石。

戈斯拉尔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922年,当时它因拉梅尔斯贝格矿山的银矿而崛起。

如今,这座城市与矿山以及上哈尔茨山水资源管理系统一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仅记录了欧洲早期采矿工业的辉煌,也展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

要想了解戈斯拉尔遗产,拉梅尔斯贝格矿山是必去之地。该矿山文字可考的开采历史已有1000年,直至1988年才停止运作,是德国乃至欧洲早期矿业的代表。今天,它以博物馆和遗址的形式,展示着工业文明的起源。

进入矿山的地下巷道,空气中仍弥漫着机油和化学原料的味道,岩壁上隐约可见早期采矿留下的痕迹。讲解员说,最初,矿工需要用最原始的自制工具挖掘矿石,每一锤都要靠手臂的力量挥下。矿山的机械展览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蒸汽动力的水轮机、矿石提升和浮选设备……这些看似陈旧的机械却是工业革命的重要奠基石。

随着资源的枯竭,戈斯拉尔不得不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而,从一个依靠矿业的城市转型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中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矿山关闭后,当地居民开始意识到,他们不仅需要保护自己的历史遗产,更需要赋予它新的生命。

拉梅尔斯贝格文化遗产基金会新闻发言人马丁·韦策尔接受采访时表示,戈斯拉尔文化保护的成功得益于三点:该基金会同其他科研机构深入研究当地文化遗产的性质和用途,为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居民进行充分的沟通,解释保护法规的重要性,确保居民在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配合保护工作;同地方政府、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参与保护规划,为文化保护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

韦策尔举例说,此地处于德国山区,冬季漫长而寒冷,但为了保持建筑原有的特色,与附近的老城风格一致,博物馆的窗户至今仍避免使用外观更加现代化的双层玻璃。“从节能的角度看,这其实不好。但在德国,文物保护受到非常严格的法律约束,即使是更换玻璃这种小事,也必须和文物保护部门协商并获得批准。”

今天的戈斯拉尔不仅是游客的天堂,更是文化与艺术交汇的舞台。老城的小巷里,传统工艺店和现代咖啡馆并存,木雕、陶艺制品与手工金饰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活的博物馆。在这里,1500多座古老的木桁架房屋不只是装饰,还是富有烟火气息的民居;工业遗址不仅是遗产,还是培养下一代的教育基地。戈斯拉尔没有让历史成为沉重的负担,而是将它化为一种文化自信,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据新华社电)

本版编辑 韩叙 杨啸林 美编 王子莹

来稿邮箱 gjb@jrb.cn

走进

王自强

邵思聪

可持续的可可产业链

梁桐

瑞士的巧克力行业因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庞大的产业规模、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突出的品牌效应,在全球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瑞士人出门旅行,总会随身带上几块本国生产的巧克力作为休闲零食,而来瑞士旅游的外国游客,也往往会选择巧克力当作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

不过,在巧克力给消费者带来甜蜜的同时,身处于价值链初始端的可种植业者的生产生活,却并未因产品大卖而得到明显改善。瑞士某巧克力工厂有个著名的巧克力生产流程展览,就生动复刻了这一幕:可可豆最大的产区在非洲。这里天气炎热,基础设施、生活设施都不完善,从种植到初加工各个环节的劳动强度很大。更糟糕的是,由于可可农普遍缺乏议价能力,在与贸易商的谈判中大多处于不利地位——可可农的经济利益和生活福祉缺乏保障,是巧克力行业的现实情况,也是威胁整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最近,在瑞士苏黎世,巧克力从业者便聚集在一起,就如何打造更具可持续性的可可价值链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让“消费端的甜”不再建立在“生产端的苦”之上的行业升级目标。

瑞士经济事务秘书处贸易司司长莫妮卡·鲁比奥罗坦言,近年来,瑞士政府收到了大量关于巧克力产业“黑暗面”的媒体问询。在她看来,要解决这些长久以来一直未获重视的问题,需要政府引领,聚集起全行业的集体智慧。

2017年,经济事务秘书处代表瑞士联

邦政府,参与组建了“瑞士可持续可可平台”,力争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合力,推动建设可持续的可可价值链。除政府外,平台的成员单位还包括巧克力制造商、贸易商、零售商、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莫妮卡称,组建这样一个大平台,就是为了让巧克力生产价值链上的所有主体参与进来,提高可可生产和价值链全链条的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性,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可可经济。

截至目前,瑞士经济事务秘书处已先后分两批对该平台提供了总预算达2200万欧元的资助,并且动员本国在加纳、哥伦比亚、秘鲁等可可主产区的各方力量予以配合。其中,相关企业正在发挥更大作用,利用技术和资金优势帮助可可农增产增收。

比如,瑞士伊卡姆农工商有限公司的业务覆盖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可可主产区——西非地区业务活跃。该公司已于2022年启动了“智能可可”项目,将其收购网络覆盖的18.5万农户全部纳入项目范围,为这些农户提供农业技能培训、设备租用、种子发放等,提高其生产效率。同时还提供市场价格咨询服务,帮助农户更好链接市场,及时调整产量,保障其权益。

瑞士家喻户晓的巧克力品牌Halba则将工作重点放在绕开“赚差价”的中间商,让公司支付的费用直达农户方面。此前,许多可可产地小规模农户提供的产品,往往难以达到直接收购的标准,还需中间商进行加工。对此,Halba安排技术人员帮助

农户迈向规范标准化种植,引入果汁提取机、干燥设备等简单的加工设备,实现产品的品质控制,提升了直接采购比例。

此外,Halba还通过其独特的“动态农林”项目推动可可种植转型,即不再仅仅聚焦可可单一作物的产量最大化,而是致力于推动整个农林生态系统优化。通过这种方法,部分项目区域进一步丰富了种植户收入来源,与可可混合种植的玉米还为其提供了优质主粮。

提高可可果实利用率也是打造可持续的可可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传统工艺,每一颗可可果实中可直接用于制作巧克力的部分只占25%,剩余75%的果肉、果壳等只能被丢弃。不过,创新技术正使这一局面得到改观。总部位于苏黎世的KOA公司可以对可可果实的果肉、果壳分类加工,制成饮料和沙拉拌料等,还与瑞士莲公司合作,以可可果壳为原料生产调味剂以及创新型黑巧克力。对可可果的充分利用,使种植农户从中获取了更高收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不再将西方发达国家视作“必然模板”,而是着力寻找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这是一个积极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需要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不再是发展范式,而是赋能工具。巧克力由苦涩变香甜,靠的不仅仅是加奶、加糖,更是对人类福祉的念念不忘以及对创新科技的孜孜以求。